

论马克思对布鲁德尼“证成难题”指认的可能回应

黄 洋

[摘要] 布鲁德尼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至1846年间面临着“证成难题”的困境,即此时的马克思既表述了一些只有通过哲学和道德才能证成的观点,但又拒绝使用二者作为证成工具,因而无法向工人证成这些观点。虽然马克思生前未曾听闻该指认,但在他的语境下,其持有的、后人称之为“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思想及推论消解了“证成难题”。在可能的意义上,马克思将援引它们来回应这个指认。该思想可概述为两个命题:人的理论活动是实践活动的随附者;特定的理论是业已存在的历史进程实践方面的思想表现。基于前一个命题,马克思认为工人在共产主义社会性质的实践中就能够相信这些观点。但布鲁德尼指出,这将引发“第一步的难题”;基于后一个命题,马克思认为他的观点是作为历史实践的现实无产阶级运动的思想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证成难题”和“第一步的难题”的前提实际上已被否定。

[关键词] 马克思;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布鲁德尼;证成难题

[作者简介] 黄洋,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在艾伦·伍德(Allen Wood)关于马克思反对正义的著名论文发表后,以道德为主题的研究搅动了一度沉寂的英美马克思主义学界。悉尼·胡克(Sidney Hook)感慨道:“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观点在西方思想界(特别是在英美学术界)的复兴,是一个矛盾乃至饶有趣味的问题。”^{[1](250)}在该热潮方兴未艾的20世纪90年代,曾师从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丹尼尔·布鲁德尼(Daniel Brudney)借助英美学界在马克思主义与道德问题上积累的丰厚成果,以1844年至1846年马克思的哲学观为主线,在《马克思告别哲学的尝试》(*Marx's Attempt to Leave Philosophy*,以下简称《告别》)^①中指认马克思存在一个他称之为“证成难题”(the problem of justification)的困境。布鲁德尼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的思想均存在“证成难题”,并强调马克思最终需要一种“他不屑于运用同时不自相矛盾就无法运用的证成”^{[2](361)}。

与以往对马克思的外部批判不同,布鲁德尼的“证成难题”指认建立在对马克思文本的严格分析之上,是一个语境内部的严肃论题,必须认真考察。然而,马克思从未意识到自己存在一个“证成难题”——凭借一种特殊的哲学思想,他无意中站在了一个可以合理消解该难题的立场上。人们通常称这个思想为“理论与实践相统一”(the unity of theory and practice)。本文将在呈现整个指认的逻辑与现有回应的基础上,论证如下观点:在马克思的语境下,后人称之为“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推论无意中消解了该难题,在可能的意义上,马克思将援引这些推论来回应该指认。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人类共同价值研究”(21&ZD014)的阶段性成果。

①中译本参见丹尼尔·布鲁德尼:《马克思告别哲学的尝试》,陈浩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本文在引用布鲁德尼原著时参考了该中文译本,并在关键概念如“证成难题”的译法上与该中译本保持一致,但在具体引文的翻译上有出入,后文不再一一指明。

一、“证成难题”指认的内在逻辑

按布鲁德尼的说法,马克思既提出了一些工人只有接受证成才能相信的观点,但他又无法向工人证成它们。根据《告别》及后续发表的论文,最主要的命题有两个:(1)劳动(必要劳动)是人类的自我实现活动;(2)资本主义违反了分配正义的要求^[2](192,347)]。命题(1)来自《手稿》,而命题(2)来自《形态》。尽管出处不同,但它们都是马克思理论的组成部分。

命题(1)属于英美马克思主义学界盛行的“自我实现式”解读。布鲁德尼指出,马克思1844年的善好生活观念包括如下要点:“就人的善好生活(good life)而言,关键在于参加一项特定的活动,即人为了表达自我而改造物质世界,同时在日益趋高的物质条件下维持自身和其他人的存在。”^[3](372)]由于此时的马克思将这种活动理解为必要劳动^[3](374-375)],因此必要劳动是人类的自我实现活动。《手稿》显示它包含两个不可或缺的要件:第一,劳动者在劳动中实现自身的个体本性;第二,劳动者在劳动中实现自己的类本性。特别地,如果要证成第二个要件,客观上,劳动者必须在劳动中彼此结成恰当的关系结构,从而做到“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4](183-184)];主观上,劳动者须认识到彼此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他人的需要。

命题(2)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的谴责^①。根据布鲁德尼的陈述,它是从马克思的下述批判中提炼出来的:资本主义造成了过度专业化与自主选择自由匮乏的现象^[2](300)]。就这种过度专业化而言,马克思曾批评道:“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5](37)]而就个人自由的匮乏,马克思指出,“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5](84)]。布鲁德尼认为这些批评确实可纳入一个分配正义批判的框架:正是资本主义在资源和机会分配上的不公正,造成了上述消极现象,同时使得只有少数人能够实现他们或多或少正确(more or less correct)的善好生活观念^[2](348)]。

那么,布鲁德尼认为马克思无法向工人证成它们的理由是什么?就命题(1)来看,理由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马克思无法以举出经验证据的方式来使工人相信“劳动是人类的自我实现活动”。马克思如果要做到这一点,那么需举出的证据就是当前工人的经验中劳动表现为人类的自我实现活动。但是,马克思承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在工人的经验中仅表现为谋生的手段^[4](55)],这是此时人们能够拥有的唯一真实的经验。因此,马克思无法证成命题(1)。

不过,如果存在少数工人能够经验到其在劳动中实现了自身呢?布鲁德尼的回答是:这只能使工人相信“劳动是个人的自我实现”。他强调,使工人相信“劳动是人类的自我实现”还需要一个前提,即劳动者相信自己在劳动中确证了自己的本性——以类成员存在^[2](202)]。按照布鲁德尼的解读,马克思认为劳动者能否相信这一点取决于他们在劳动中是否肯定彼此为了他人的需要而生产,做到“你那方面所发生的事情同样也是我这方面所发生的事情”^[4](184)]。但马克思曾指出,对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来说,他们只会肯定所有人的生产目的都是为了私人需要^[4](183)]。所以,不存在证成第二个要件的经验证据,即工人肯定彼此的生产目的是他人的需要。在这两个要件的经验证据都不存在的情况下,马克思无法向工人证成命题(1)。

命题(2)是一个规范性命题,它本身无法以列举经验证据的方式得到证成。那么为什么不诉诸道德和道德哲学呢?而且,道德哲学还可以用来证成命题(1),是具有最大公约数的证成工具。问题

^①布鲁德尼认为命题(2)基于马克思在《形态》中持有的善好生活观,而它们对善好生活的描述已经不同于《手稿》。相关论述参见Daniel Brudney, *Marx's Attempt to Leave Philosoph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310-322。

在于,布鲁德尼指出可用以证成这两个命题的工具——哲学和道德——其合法性均已被马克思否定,所以他仍然无法向工人证成这两个命题。布鲁德尼的论证如下:

首先,马克思在《手稿》中批判了哲学。哲学问题以“人的自然感觉还没有被人本身的劳动创造出来”^{[4](128)}为前提,即以劳动异化为前提。根据马克思的这个观点,思考哲学就是只有那些处于异化状态下的人才会做的事情^{[2](213)}。因此,人们在这种活动中得到的知识并非真知。其次,马克思在《形态》中继续批判了哲学。马克思认为,是脑体分工带来了心物关系等哲学问题^{[2](293)},这种分工也使得哲学家错误地假定了自身内容的真实性^{[2](274)}。最后,在《形态》中马克思对道德有极强的敌视态度^{[2](323)}。在马克思看来,道德无论如何都与统治阶级的观念难脱干系,或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思想表现^{[2](329-332)}。

综上所述,基于事实的经验证据无法证成马克思的两个命题,而哲学和道德作为证成它们的工具又是“非法”的,故工人很难相信这些命题。有趣的是,马克思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自然界的和人的通过自身的存在,对人民意识来说是不能理解的,因为这种存在是同实际生活的一切明显的事实相矛盾的。”^{[4](91)}布鲁德尼的结论是:马克思的确存在一个名为“证成难题”的困境。

二、“证成难题”指认的是非争论

不过,布鲁德尼提出“证成难题”指认的用意并非全盘否定马克思的思想。如他所言,既然没有理由认为哲学是一种绝对有害的学说,那么只要马克思肯重新诉诸哲学这一证成工具,就能够解决他面临的“证成难题”^{[3](388-389)}。这一办法看似合理,但却以否定马克思对哲学的批判为代价^①。对此,布鲁德尼坦言:“认真地看待马克思就是认真地对待他——严格地审查他的观点,指出它们存在的问题。”^{[6](161-162)}如果事实并非如此呢?有些学者持不同意见,在他们看来,布鲁德尼的“证成难题”指认本身就值得怀疑。我们将在下文陈述学界现存的几种回应。

第一,部分研究者认为“证成难题”指认不成立,因为《形态》时期的马克思不存在“证成难题”。他们的观点可概述如下:

一是马克思在《形态》中表明他不持有以共产主义社会为主题的善好生活观念^{[7](286)}。该论断的依据是马克思的这句话:“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8](539)}既然如此,说《形态》时期的他无法证成这些观念就是无的放矢。

二是马克思在《形态》中表明,作为实践的共产主义者,他们知道自己的任务是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改造人和社会,而不是提出关于人性本质的理论并以此作为促使工人行动的信念^{[9](89)}。这样一来,说马克思无法证成他的善好生活观念就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形态》表明他已经不再重视自己曾持有的这些观念。

第二,有学者指出,由于马克思认为革命以及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所以马克思既不关注如何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证成他的观点,也不关心如何以理性的方式促使工人迈出第一步,所以“证成难题”对他来说不是关键问题^{[10](37)}。

第三,有研究表示1847年之后的马克思不存在“证成难题”。虽然“证成难题”指认不涉及《形态》之后的马克思,但这种回应思路仍构成一种“发展性回应”。具体来说,从1847年起,马克思基于自我

^①另一边,凯·尼尔森(Kai Nielsen)论证了道德同马克思学说的兼容性,但他没有为此而否定马克思本人对道德的批判。参见凯·尼尔森:《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观念——道德、意识形态与历史唯物主义》,李义天译,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81页。

实现的资本主义批判进入“充分性反对”时期。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事实性矛盾:其既塑造了更为充分的个体自我实现的潜能,又阻碍了这种潜能的现实化,而这种矛盾正是个体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客观动力。因此,处于“充分性反对”时期的马克思就不再需要道德哲学来证成他的批判了^{[11](46-47)}。

第四,有研究者认为“证成难题”指认对马克思来说不成立,因为马克思坚持人类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之间的紧密关系,而这种观念将使得他超越该困境。露丝·阿比(Ruth Abbey)指出:“布鲁德尼强调传统认识论的范畴——例如见证(seeing)和相信真理,但这就模糊了马克思在行动(doing)和知道(knowing)之间建立起来的密切联系。”^{[12](153)}在阿比看来,1844年的马克思会认为个体主观认知过程与其客观行动是不可分离的。这就是说,个体将通过参加克服私有制的革命运动获得马克思提出的善好生活观。证成环节在这里没有存在的必要。因此,在马克思的语境中不存在“证成难题”。

然而,上述回应似乎都有困难之处。第一种回应的问题在于,很难说写作《形态》时的马克思不持有任何关于未来社会的善好生活观念,尽管他自己的表述好像能证实这一点。退一步说,即便《形态》中确实没有这些观念,但马克思仍希望工人参与共产主义运动。然而,这就将遭遇布鲁德尼在《告别》中提出的“第一步的难题”:受资本主义制度影响,被利己主义意识笼罩的工人缺乏迈出第一步的理由^{[2](254-260)}。如果不借助哲学和道德,就难以说服工人参加运动。而如果借助二者,这对马克思来说就自相矛盾了。

关于第二种回应,马克思的确说过“历史将会带来这种共产主义行动”^{[4](128)}。但如果论证马克思有上述看法的依据是他确证了历史发展的自然必然性,那么这就偏离了他的本意。马克思并不认为历史运动与人类实践处于一种自然规律式的外在关系(我在后面会谈到这一点)。总之,该回应道出了事实,但在归因上还有争论的余地。

第三种回应指出,资本主义事实上阻碍了人更加充分的自我实现的潜能完全实现,这构成了个体转向共产主义的“客观动力”。但布鲁德尼可能会说这个“客观动力”对个体有效只是因为:(1)它在主观领域能表现为“人的自我实现潜能应当不受阻碍地充分转化为现实”的命题;(2)个体能够相信该命题。显然,只有在借助道德或道德哲学的情况下才能使人们相信这一命题。

最后,布鲁德尼亲自回应了阿比的批评。布鲁德尼声称自己感到很困惑,因为其已经明确指出:在1844年的马克思看来,个体获得善好生活知识的过程与特定情况下的特定形式的活动绑定在一起^{[6](157)}。假如我们同意工人是在特定的实践中同时获得马克思的善好生活观念,那紧随其后的就是“第一步的难题”。

看起来布鲁德尼的指认已经成为一座难以攻克的堡垒。但正如J.M.伯恩斯坦(Jay M. Bernstein)所言,布鲁德尼没有看到马克思的反哲学立场延续了从康德到黑格尔的思想传统,即主体获取知识的过程同其能动实践密不可分^{[13](277)}。该传统涉及以下两对关系: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的关系、理论与实践活动的关系。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这些关系中的两端有着不可调和的对立,直到黑格尔以绝对观念论的方式弥合了它们,而马克思则在扬弃前者的基础上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尽管阿比援引了马克思论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关系的思想来回应布鲁德尼的指认,但是其一方面无法摆脱“第一步的难题”,另一方面也忽视了马克思关于另一对关系的思想成果,而这正是马克思回应上述指认的可能依据。我们的论证将从马克思与黑格尔在这一传统上的继承关系开始。

三、“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与“证成难题”的消解

“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常见的一个命题,同时也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标志

性观点^{[14](xiv)}。然而,它的含义之多样,几乎等于被提及的次数^①,其内涵一般有:(a)人们从事理论活动的动机是实践上的需要;(b)人们应当为实践需要而从事理论活动;(c)理论的内容反映了实践活动;(d)理论的真理性需要通过实践活动来检验;(e)人的理论活动是实践活动的随附者^②;(f)特定的理论是业已存在的历史进程实践方面的思想表现。上述内涵都能合理地归于马克思吗?(a)和(b)是正确的,但有学者认为它们不是马克思主义特有的命题^{[15](912-913)}。(c)和(d)则是主流理解。若要探究后人关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解释中的哪一种最贴合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唯有回到他的著作中去。在下文中,我们将力图证明:第一,马克思基于黑格尔哲学形成并持有(e)和(f)这两个均被后人称为“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命题;第二,在马克思的语境下,(e)的推论和(f)的推论均有效消解了“证成难题”,但后者的解释更加全面。

1.“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人的理论活动是实践活动的随附者

截至马克思生活的年代,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的二分法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③。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指出,古希腊哲人赞美纯粹的理论活动,并将其同政治实践明确区分开来^{[16](21)}。尽管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Scientia et potentia humana in idem coincidunt”^{[17](192)}(人类知识和人类权力归于一)^{[18](8)}迈出了颠覆传统观念的重要一步^④,但他却丝毫未涉及人类活动的二分法。

试图克服这种二分法的是黑格尔。这一尝试以18世纪末德国的“理论—实践”之争为语境^{[19](37)}。法国大革命的混乱引起了德国思想界的争论:在理性思维演绎的道德—政治理论和包含传统与习惯的实践经验之间,谁才是政治生活的指导者?保守主义者认可实践经验的指导地位,声称纯粹理性的理论对于促成人类实践的意志是无效的^{[20](284)}。而康德根据理性思维对意志的统摄地位主张理论的实践有效性,针锋相对地指出“凡是根据理性的理由对于理论是有效的,对于实践也就是有效的”^{[21](214)}。黑格尔的策略是论证主观精神(人)的思维与意志相同一。他在《哲学科学百科全书III:精神哲学》中指出,当思维发展到“推论”即实现与对象相同一的思维时,它就成为意志。只有对表象来说思维和意志才是分开的,思维实际上是意志的实体性内容,“以至于没有思维任何意志都是不可能的”^{[22](261)}。

但思维与意志的同一也是一个过程,它直到主观精神的最后阶段——“自由精神”——才显现出最高状态(具体表现为“自由意志”)。(1)此时的思维和意志已于存在上成为一体。“它们都是一个东西,同一(dasselbe)的东西。”^{[23](36)}(2)此时的意志与思维一样,实现了自身与对象的同一^{[23](35-36)}。(3)此时双方互为前提。“其实,如果没有理智(Intelligenz)就不可能有意志……同样,如果没有意志人们也不大可能进行理论的或思维的活动。”^{[23](36)}(4)此时的思维和意志是同一个活动过程的两个方面。黑格尔指出,人类只要在思维,就是在活动的^{[23](36)}。思维和意志的区别无非就是理论态度和实践态度(Verhalten)的区别^{[23](35)},而态度只有依附于人的活动才能触及对象,因此二者的差异就是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的差异,它们在过程上不过是一体两面。让-弗朗索瓦·科维刚(Jean-François

① H.B.阿克顿(Harry Burrows Acton)曾总结“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全部含义共有六种。具体参见H.B.Acton, *The Illusion of the Epoch: Marxism-Leninism as a Philosophical Creed*, Carmel, IN: Liberty Fund, Inc., 2003, p.252。

② “随附”(supervenience)是当代心灵哲学、元伦理学中常用的概念。它的基础定义为: x 随附于 y , 当且仅当 x 改变 y 也改变。关于“随附”的更多信息,参见斯坦福哲学百科“Supervenience”条目。

③ 关于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的二分法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嬗变,可参考郁振华:《论哲学中的实践转向》,《学术月刊》2023年第12期,第5—15页。

④ 根据尼古拉斯·洛布科维茨(Nicholas Lobkowitz)的研究,同时代的笛卡尔等人仍倾向于认为理论活动的合理性无需“有用”的成果来辩护。参见Nicholas Lobkowitz, *Theory and Practice: History of a Concept from Aristotle to Marx*,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7, p.91。

Kervégan)提醒我们上文的思维和意志并不是经验或先验主体的能力,而是去主观性的精神的构成部分^{[24](40)}。因此“理论—实践”之争就只是整个精神发展过程中的小插曲,其必将被克服,而真正能够指导人类政治生活的是法。法是那个真正同一了思维与意志的“自由意志”的定在。

我们已经分析了黑格尔哲学中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的关系,特别地,上文中的(1)和(4)表明作为主观精神的人,其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是存在上的同一体,是同一个活动过程的两个方面。这两个观点在马克思的《手稿》中得到了继承(后在《形态》中进一步具体化),但是,第一,现在两种活动的存在同一体表现为人的集体实践活动,而不是“自由意志”;第二,虽然两种活动仍然是同一个活动过程的两个方面,但此一过程被马克思规定为实践活动。

首先,马克思认为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同一于实践。他说,“我的普遍意识的活动——作为一种活动——也是我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理论存在”^{[4](84)}。这句话有两个要点:(1)人的“普遍意识的活动”是以理论形式存在的人的存在;(2)人的存在是“社会存在物”。就(1)来看,马克思曾指出思维是人进行意识活动的器官^{[4](84-85)},因此意识活动的载体是思维,存在形式是“理论形式”;就(2)而言,在马克思看来,当我们说人的存在是“社会存在物”时,这是人在主观上反思自身存在所得到的结果^{[4](84)}。而从客观现实来看,马克思指出人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4](83)},即具有社会性质的实践活动。这样,原句的意思就是,“普遍意识的活动”是以理论形式存在的社会实践活动。因而当马克思说“思维和存在虽有区别,但同时彼此又处于统一(Einheit)中”^{[4](84)}时,他的意思实际上是二者呈现出“同一”而非“相互作用”的关系。

马克思在《手稿》中没有严格地区分意识活动和理论活动,在他看来,后者似乎仅是以更为复杂的样态呈现出来的前者。如果是这样,那么马克思会认为理论活动亦是以理论形式存在的社会实践活动。这就是说,我们称之为“理论活动”的那种活动本质上就是实践活动(只不过以另一种形式存在)。尽管缺乏直接的参考文献,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还是敏锐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可能存在一个类似于“认识就是行动”的观点^{[25](296)}。

其次,马克思认为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是同一个实践过程的两个方面,或者说,理论活动是实践活动的随附者。说二者存在随附关系,意味着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人进行理论活动的同时不进行实践活动。根据《手稿》,思维器官(它也是理论活动的承载者)在对象性关系中发挥作用^{[4](85)},而对象性关系与对象性活动同生同灭,因此思维的活动与对象性活动同步。虽然人的对象性活动有理论和实践之分^{[4](56)},但我们已经知道理论活动是实践活动的特殊形式,所以思维活动是与实践活动同时进行的。由于承载理论活动的思维器官与实践活动同步,因此人在从事理论活动的同时从事实践活动。一些学者注意到了这个观点。G.A.科恩(Gerald Allan Cohen)指出,如果马克思确实有一个可称为“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思想,那么最好将它的内涵理解为:社会主义状态下的人其理论活动内在于实践活动的过程中^{[26](457)}。可以看到,科恩的理解同我们是基本一致的^①。

综上所述,从黑格尔哲学中最终衍生出了一条哲学人类学原理:人的理论活动是实践活动的随附者。命题(e)是马克思所持有的观点。

那么在马克思的语境下,从(e)得出的推论是如何消解“证成难题”的?根据命题(e),人将在参与实践的同时进行理论活动。这就是说,实践的参与者将在活动过程中形成、获得和相信一些观念(理论)。马克思的确是这么认为的。他在1844年说:“英国和法国的工人成立了各种联合会……这些群众的共产主义的工人……他们知道,财产、资本、金钱、雇佣劳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决不是想

^①需要指出的是,科恩将这种随附关系限定在未来社会,而《形态》表明其自人类诞生以来就存在了。《形态》中的相关论述,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4—525页。

象中的幻影,而是工人自我异化的十分实际、十分具体的产物。”^{[8](273)}这段话有两个要点。第一,在马克思看来,联合会的活动是具有共产主义社会性质的活动,即具有未来社会的特征。他在同年的《手稿》中指出,工人在联合活动中放射出了“人类崇高精神之光”^{[4](129)}。考虑到异化的普遍性,这种精神之光所蕴含的真情实意只能存在于共产主义社会中。第二,马克思在此没有提到任何位于实践活动外的教育环节。结合上述两个要点,马克思的意思实际上是:当无产阶级正在从事具有共产主义社会性质的实践时,其知道财产、资本等事物是自身陷入异化状态的实际产物。由于工人只有在相信特定理论的情况下才能知道某些社会事物源于异化状态,而相信一个理论又以它存在于头脑中为前提,所以引文表明马克思持有如下观点:工人在具有共产主义社会性质的实践中同时形成、获得和相信特定的理论。这正是基于命题(e)得出的见解。马克思在《形态》中仍持有同样的看法:“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实现事业本身,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是必需的,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8](543)}可见,革命同样是具有这种性质的实践。因而当卢卡奇说“正如作为阶级的无产阶级只有在斗争和行动中才能获得和保持它的阶级意识”^{[27](99-100)}时,他的确道出了马克思的本意。

尽管马克思没有明确表态,但从他对工人意识内容的描述来看,这些内容似乎包含他的理论。由此可以推断,马克思认为那些投身联合或革命的工人将在实践过程中相信他的观点。已知“证成难题”以此为前提——工人只有接受证成才会相信马克思提出的观点,而在马克思的语境中,虽然他持有的命题(e)及其推论没有直指该难题,但这个推论实际上否定了它的前提。由于前提的否定意味着难题的消解,所以马克思无意中消解了“证成难题”。因此,若马克思有机会回应该指认,他将援引命题(e)的推论。

不过,布鲁德尼并没有忽视马克思的命题(e)及其推论。在分析《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布鲁德尼声称马克思表达了一种名为“同步模式”(simultaneity model)的主张:认识内在于人的行动中,改造世界即解释世界的正确方式^{[2](237)}。马克思相信工人在革命实践中将认识到他揭示的真相,即便当下没有经验证据可以证成它们。

但“第一步的难题”对马克思来说仍然存在。为什么工人要迈出参加这种实践的第一步?如果说这是为了追求“劳动是人类的自我实现”,那么普遍的异化状态使工人自己不太可能有这种念头。如果说靠共产党人来动员,那么他们势必要借助道德和哲学来进行这项工作,但这就同马克思的本意相悖了。直到这时,“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另一重含义才得以凸显。

2.“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特定的理论是现实历史实践的思想表现

实际上,黑格尔对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贡献还体现在他的世界历史思想中。它的主题是理论与实践活动的关系。要理解这一点,必须结合黑格尔的那句名言:“凡是有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有理性的。”^{[23](12)}据海涅回忆,当他问黑格尔是否现实的都是有理性的时,后者怪笑着说:“它也可以这么讲:凡是有理性的,都必须存在。”(Es könnte auch heißen: Alles, was vernünftig ist, muß sein.)^{[28](235)}所以,如果有理性的东西必然成为现实,那么这该如何实现?黑格尔强调,作为“普遍物”和“抽象物”的精神^①只有通过人的意志活动才能成为现实^{[29](22)}。然而,活动着的精神还要求认识它自己。也就是说,把它自己作为思维的对象来把握^{[30](49)}。这种精神自我把握的思想成果则是哲学。

哲学的特殊性在于以下四点。(1)哲学阐述的是“现有”而非“应有”^{[23](11)}。(2)哲学是以思想形式

^①黑格尔在《哲学科学百科全书 III:精神哲学》第439节指出:理性作为知识的真理就是精神。因此,这两个词语在黑格尔的体系哲学内部指的是同一个对象,可相互替换。参见黑格尔:《黑格尔著作集:第10卷》,杨祖陶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08—209页。

存在的理性。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说“哲学也就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23](13)}。(3)哲学必然成为现实。由于理性成为现实的必然性,哲学所阐述的理性原则必然在特定的实践活动中成为现实。人们不必担心这种能够实现哲学的实践何时出现,因为黑格尔曾说哲学不过是业已完成的历史进程的思想再现^{[23](15)}(虽说他也有相反的看法)^①。(4)哲学在思想上表现了这种特定的意志实践。“这多方面的全体都反映在哲学里面,以哲学作为它们单一的焦点,并作为这全体认知其自身的概念。”^{[30](56)}

结合(2),我们会看到特定的理论和特定的实践活动共同构成了理性向现实运动的两个方面。如黑格尔所言,“这个原则在德国是作为思想、精神、概念,在法国是在现实界中汹涌出来”^{[31](244)}。同时根据(4),人们也看到了世界历史进程中理论与实践活动的关系。而一个理论能否成为特定实践活动的思想表现,取决于它是否为时代的学说。

我们已经陈述了黑格尔视域中哲学的四个特殊性。首先可以确定,马克思在事实上接受了这些观点。他在1837年声称自己克服了曾困扰他的“应有之物”(Sollenden)与“现有之物”(Wirklichen)的对立就是一个明证^{[32](7-8)}。马克思后来说“哲学不是在世界之外”,“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33](220)}。什洛莫·阿维纳瑞(Shlomo Avineri)认为这些论断明显以《法哲学原理》为背景^{[34](152)}。所以当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信中说“我们是从世界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那时就可以看出,世界早就在幻想一种只要它意识到便能真正掌握的东西了……最后还会看到,人类不是开始一项新的工作,而是在自觉地完成自己原来的工作”^{[33](66)}时,他实际上再现了黑格尔哲学特殊性思想的基本要义。首先,理论所阐发的不过是世界自身的目标;其次,正是世界早已渴望向该目标进发,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理论,世界将实现由该理论所揭示出的目标;最后,理论在思想上表现了世界为实现该目标而进行的“原来的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引文中的“我们”一词表明该理论的作者已经知道自己正在阐发世界的学说。

既然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论已现颓势,那么当前的任务就在于重新寻找世界历史的真实图景——成为世界的理论必然要以对世界历史的正确把握为前提。马克思的结论是,当前的世界历史正朝着扬弃私有财产、重新占有人的本质的共产主义阶段进发^{[4](81)}。马克思相信上述结论的正确性证明了他的学说是世界的理论,这就是为何他说历史将会带来其在思想中已经认识到的那场共产主义运动^{[4](128)}。而我们已经知道只有黑格尔笔下的哲学才能享此殊荣。可以从中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从马克思的视角来看,他所阐述的不过是当下历史的真实情况;第二,马克思在著述中以积极口吻提到的共产主义理论实际上指的就是他的理论。马克思随后指出:

(1)对历史的意识来说,它知道整个历史进程的理论方面表现为人类逐步理解和认识到“完成了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史。“因此,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对它的思维着的意识来说,又是它的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8](186)}而《手稿》不仅指出全部历史进程的理论方面就是这个理论史,还描述了它的具体内容^{[4](78-81)}。因此,引文暗示创作《手稿》的意识是历史的意识,由该意识提出的理论是当前历史运动的理论方面(其显然是自知这一点的)。

(2)当前历史进程的实践方面是共产主义运动^{[4](81)},参与者是工人。

①黑格尔说:“在政治实存进入转变的时代,哲学有它的地位……思想在先,改变现实。”(In den Zeiten, wo in der politischen Existenz eine Umwälzung eintritt, hat die Philosophie ihren Standort... Das Denken geht voran, die Wirklichkeit zu verändern.)这句话表明哲学亦有“未来预见者”的地位。参见G.W.F.Hegel,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Erster Band, hrsg. v. Johannes Hoffmeister, Leipzig: Felix Meiner Verlag, 1944, p.371。感谢邓安庆老师的原文和陶在峰同学的帮助,本文参考了二位的中译。

(3)当前历史进程的实践方面已经存在。“社会主义……只要它的有组织的活动在哪里开始,它的自我目的,即它的灵魂在哪里显露出来。”^{[35](395)}

(4)共产主义理论是已经存在的当前历史进程实践方面的思想表现。马克思说:“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他们(指共产主义理论家——本文作者注)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8](616)}正如阿尔弗雷德·G.迈耶(Alfred G. Meyer)所言,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共产主义思想不是基于哲学的某种理想,而是现实阶级运动的思想表达^{[-36](97)}。

综上所述,对马克思来说,特定的理论是业已存在的历史进程实践方面的思想表现。命题(f)是马克思持有的观点,其源于黑格尔提出的、马克思继承的哲学特殊性思想。这就是为何卡尔·科尔施(Karl Korsch)如此强调:只有通过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才能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体系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表现^{[37](44-45)}。在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看来,所谓马克思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就是这种主张思想与历史进程相一致的观点^{[15](1024)}。

然而,一旦证明马克思持有命题(f),对他来说,“证成难题”和“第一步的难题”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了。我们已经在上一节提到了“证成难题”的前提,但通过命题(f),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是无产阶级实践的思想表现。对他而言,这就意味着工人无须接受证成就可相信他的理论,因为该理论不过是工人意识的集中表达。尽管马克思没有用命题(f)及其推论指向“证成难题”,但在他的语境中,这个推论实际上否定了该难题的前提。若有机会,马克思将援引后人称之为“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命题(f)的推论来回应指认。

另一边,“第一步的难题”以无产阶级尚未投身革命运动为前提。而通过命题(f),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是业已存在的无产阶级实践的思想表现。他的共产主义理论存在本身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已经迈出了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步。在马克思的语境下,由于他持有的命题(f)的推论实际上否定了“第一步的难题”的前提,因此也就无意中消解了该难题。在可能的意义上,这个推论还是马克思回应“第一步的难题”指认将援引的观点。

就事实来看,马克思生前也从未系统论证过其共产主义学说的价值合理性。在他看来,这种工作属于那些空想家,他们的理想远在世界之上,从而不得不借助道德来说服群众。直到马克思去世,“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被实证主义式的理解完全掩盖后,围绕整个学说的证成争论才浮出水面。

总 结

本文从布鲁德尼对马克思存在“证成难题”的指认出发,主要阐述了三方面的内容:(1)“证成难题”指认的内在逻辑;(2)学界对“证成难题”指认的回应;(3)为何马克思对该指认的可能回应是援引“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推论。纵观整个难题,其关键之处在于:工人是否只有接受证成才能相信马克思的观点?一些学者看到了马克思关于人类理论活动随附于实践活动的思想,并指出他认为工人在实践中就能相信这些观点。但布鲁德尼以“第一步的难题”阻碍了这种回应。通过一种后人称之为“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思想,马克思确证了他的理论是世界历史进程的理论方面,因此其亦是业已存在的历史进程实践方面(无产阶级运动)的思想表现。在可能的意义上,他将援引该观点来回应布鲁德尼的指认。虽然马克思坦言实现共产主义将经历一个极其漫长、艰难的过程,但他从未认为这是一种徒劳的斗争。这可以看作他理解黑格尔哲学的一个例证:尽管哲学走向现实的过程并非轻松,但它也绝不因此而沦为与世界相对立的幻想。

[参考文献]

[1]HOOK S.Spectral Marxism[J].The American Scholar,1980,49(2) .

- [2] BRUDNEY D. *Marx's Attempt to Leave Philosophy* [M].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3] BRUDNEY D. *Justifying a Conception of the Good Life: The Problem of the 1844 Marx* [J]. *Political Theory*, 2001, 29(3).
- [4]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3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 [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 [6] BRUDNEY D. *Justification and Radicalism in the 1844 Marx: A Response to Professor Abbey* [J]. *Political Theory*, 2002, 30(1).
- [7] PITTMAN J P. *Marx's Attempt to Leave Philosophy* [J]. *Science & Society*, 2002, 66(2).
- [8]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9] 姜海波. 按罗尔斯的方式理解马克思: 评《马克思告别哲学的尝试》[J]. *马克思主义哲学评论*, 2023, 7(1).
- [10] 黄学胜. 得失之间: 论D. 布鲁德尼对青年马克思的罗尔斯式解读[J]. *世界哲学*, 2023(6).
- [11] 钟晨宇. 论布鲁德尼的青年马克思之“证成难题”: 兼对其的批判性回应[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6).
- [12] ABBEY R. *Young Karl Does Headstands: A Reply to Daniel Brudney* [J]. *Political Theory*, 2002, 30(1).
- [13] BERNSTEIN J M. *Marx's Attempt to Leave Philosophy by Daniel Brudney* [J].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2001, 110(2).
- [14] LICHTHEIM G. *Marxism: An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Study* [M].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1964.
- [15] KOLAKOWSKI L.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The Founders, the Golden Age, the Breakdown* [M]. FALLA P S (tran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5.
- [16] 伽达默尔. 赞美理论: 伽达默尔选集[M]. 夏镇平, 译.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1988.
- [17] Bacon's *Novum Organum* [M]. FOWLER T (ed.). 2nd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89.
- [18] 培根. 新工具[M]. 许宝骙,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 [19] 拜赛尔. 黑格尔[M]. 王志宏, 姜佑福,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9.
- [20] Beiser F C. *Enlightenment, Revolution and Romanticism: The Genesis of Modern German Political Thought*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21] 康德.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 何兆武,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 [22] 黑格尔. 黑格尔著作集: 第10卷[M]. 杨祖陶, 译. 2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 [23] 黑格尔. 黑格尔著作集: 第7卷[M]. 邓安庆,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 [24] 科维纳. 现实与理性: 黑格尔与客观精神[M]. 张大卫,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8.
- [25] 葛兰西. 葛兰西文选[M]. 李鹏程, 编.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 [26] 科恩. 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一种辩护[M]. 段忠桥, 译.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 [27]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 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M]. 杜章智, 任立, 燕宏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 [28] GÜNTHER N (ed.). *Hegel in Berichten Seiner Zeitgenossen* [M]. Hamburg: Felix Meiner, 1970.
- [29] 黑格尔. 黑格尔著作集: 第12卷[M]. 王志宏,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 [30] 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 第1卷[M]. 贺麟, 王太庆, 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 [31] 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 第4卷[M]. 贺麟, 王太庆, 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 [3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7卷[M]. 2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3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M]. 2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34] 阿维纳瑞. 马克思的社会与政治思想[M]. 张东辉, 译.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6.
- [3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M]. 2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 [36] MEYER A G. *Marxism: The Unity of Theory and Practice*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37] KORSCH K. *Marxism and Philosophy* [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8.

(责任编辑: 李建磊)